

编者前言

《申报》是中国报业史上创刊时间最早、出版时间最长、发行期数最多的报纸，它创刊于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（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），终刊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，共发行 25599 号。

《自由谈》是《申报》设立的一个历史悠久（一九一一年～一九四九年）的综合性副刊，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名声最响、影响最大的文化园地之一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，由黎烈文取代周瘦鹃成为《自由谈》主编。在此国难当头、世事艰危之际，《自由谈》一扫鸳鸯蝴蝶的旧气，打出“进步”和“近代化”的旗帜，拉开“自由台”的幕布，演出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史上精彩纷呈的好戏。

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、沈从文、老舍、巴金、林语

堂、叶圣陶、曹聚仁、胡风、廖沫沙……几乎所有二十世纪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化大师纷纷登台，频频亮相，他们前见古人，后启来者，登高号呼，擎旗前引，文采斑斓，思潮汹涌。

章太炎、吴稚晖、柳亚子、瞿秋白、陈望道、夏丏尊、赵家璧、傅东华、杨幸之、周扬、唐弢、艾芜、张天翼、钱歌川、施蛰存、王任叔、徐懋庸、任白戈、章克标、姚雪垠、臧克家、林徽音、欧阳山、张春桥……这里有前朝遗老，有后进新秀，有左翼领袖，有右派元首，可谓老幼咸集，群贤毕至。在这“自由台”上，自出机杼，百家争鸣，兼容并包，文潮澎湃。

《自由谈》如绚丽多彩的金沙滩：杂文、散文、诗歌、评论、小说连载、外文翻译……斑斑驳驳，五光十色。然而，影响最大、最受欢迎、最能传世的是杂文。以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为代表的《自由谈》杂文，或庄言，或谐语，或直书，或曲笔，或冷嘲，或热骂；“论时事不留面子，砭锢弊常取类型”，举凡军政劣迹，权贵丑行，世上疮痍，民间疾苦，皆化作笔底机锋、报端珍品。可以说，《自由谈》把《新青年》所开创的现代报刊杂文推向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，成为后世师表、百代楷模。

在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，我们从尘封七十年的故纸堆里，从漫漶不清的历史陈迹中，报海钩沉，文山淘金，犹如“芝麻开门”后的阿里巴巴，从沉寂多年的满藏珍宝的山洞里，翻检出这一套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

《申报·自由谈》仅截取《申报》漫长历史之一小段，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（因舆论环境恶化而暂时停刊）。

本书的编辑仅选杂文,以突出“谈”的主要特色。鲁迅先生杂文篇幅较多,因其全集专集选本已属书市常备,本书编选时也适当从略,并尽可能选择读者不常见的“新”篇目。本书的编辑得到了深圳市图书馆杨方玉先生的真诚协助,谨致谢意!

本书分为三卷,A卷为“家国民族卷”。外敌入侵,山河破碎,封建孽障作孽,民族劣根为劣,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,安内乎?攘外乎?各路民族精英泣血呜咽,“发出了最后的吼声”……

B卷为“社会民生卷”。世态光怪,民生凋零,饿殍遍于野外,贪官弹冠朝中,“自由台”上,发出了一阵阵文攻笔伐,高歌低吟……

C卷为“文化民权卷”。举凡文化论争,教育变革,民权抗辩,“自由”伪行,皆入此卷中。“曾经秋肃临天下”的一代才俊,留下了“敢遣春温上笔端”的血性文章……

由于杂文姓“杂”,上述各卷所选文章未必能尽归其位,还望见谅明察。

本书入选的篇目,左中右皆有;尊重原貌,不作订正;尊重历史,不作评说。为使今日之读者了解当时的背景,特将唐弢先生一文作为“代序”,并将鲁迅先生收编“自由谈”文的三本著作《伪自由书》、《准风月谈》、《花边文学》的前记和后记作为附录。

旧报新钞,旧文新读,虽物换人非,时移世易,仍令人击节赞叹,唏嘘不已。我们相信,不管是世故老人,还是初生犊子;不管是报界前辈,还是文坛后学,都可以从这套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中,读解当时的官场行状,窥视当时的社会万象,感知当时的文坛烽烟,体味

当时的报界气象；听一听在那“天下无道”之时庶人们如何“自由”大议。借古鉴今，温故知新，可慰过来者怀旧之情，可为后继者借鉴之镜，可作有闲者谈笑之资，可供研究者史料之用。

古今多少事，都付此“谈”中。

张云初

二〇〇〇年秋于鹏城新洲河畔莲花北村

谈谈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

(代序)

唐 弢

说起来已是抗日战争前夕的事情了,在上海,那时早就写了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》的陈子展(炳堃)教授,有一次对我说,如果要写现代文学史,从《新青年》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;如果论述《新青年》以后杂感文的发展,黎烈文主编的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又不能不写,这样才说得清历史变化的面貌。子展的那本文学史,从湘乡古文、同光诗体谈起,一直谈到五四文学革命运动,其中涉及正在兴起的议论性讽刺散文,他引《庄子·天下篇》里“以天下为沉浊,不可与庄语”,和约翰·穆勒说的“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”两段语,然后发挥说:“生于现代的中

国,要求庄语固然不可能,旁观冷嘲也不太容易。”^①这几句话说得很好,只是刚开头便煞了尾。现在的这番议论,我想,大概是准备续写时整个蓝图的一个局部吧,可惜终于没有写出来。但这些文学史家对杂感文的看法,尤其是对三十年代初期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在推动杂感文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,已经表达得十分肯定,十分清楚了。

子展是黎烈文主编《自由谈》时候的经常撰稿者,两人为湖南同乡,他对那一段历史是熟悉的,不过心有所呢,意有所钟,会不会形成一种偏见,对《自由谈》评价过高呢?经过仔细的思索和研究,我的结论是:不会!他的评价并不高!

我已经无法详细说明《申报》销路怎样因内容革新(包括《自由谈》的改组)而猛增了,但《自由谈》改组在文化界引起的哄动,却还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,记忆犹新。即以杂感文为例,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吧,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。被敌方恶意地指为“台柱”的鲁迅和茅盾,开始时,一个用“何家干”、“丁萌”、“干”、“游光”等笔名,一个用“玄”、“珠”、“朗损”、“仲方”等笔名,每隔两三天刊载一篇,筚路蓝缕,蹊径独辟,真的起了登高呼号、擎旗前引的带头作用。左翼青年纷纷出动。老作家如陈望道、夏丏尊、周建人、叶圣陶大力呼应,从各个角度刻画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:叶圣陶以《今天天气好呵!》为题,揭示了“自由”的本质,陈望道写了《法的讲法》、《长寿运动》等文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:一向从事小说创作的人,这时也群起撰写短文,老舍写了《空城计》、《励友

^① 陈炳堃: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》第十一章,太平洋书店,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版。

人书》、《打倒近视》，在风趣中透露了严肃的主题，使人作会心的微笑；沈从文写了《劝人读经》，题目刚一见报，许多人大吃一惊，以为他也主张克己复礼，尊孔崇儒，却原来劝读的是鲁迅曾经“舍金上梓”的《百喻经》；郁达夫除了《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》、《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》、《著书与教书》、《说模仿》等许多短论随笔外，还将他擅长的游记中最佳篇什如《方岩纪静》、《仙霞纪险》等篇送给《自由谈》；巴金也没有吝惜他的笔墨，自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刊出了《苦笑呻吟与呼号——给我的哥哥》。张天翼写了《小林多喜二之死》和《看了西湖艺专画展以后》。不仅小说家如此，连本来并非做新文艺工作的人也来执笔，章太炎发表了《〈庐山志〉序》（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），柳亚子发表了《为〈断鸿零雁记〉给郑正秋先生的信》（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），到一九三四年“文言、白话、大众语”论争发生，八月一日刊登了吴稚晖的《大众语万岁》，《自由谈》作为一个报纸副刊，在文化界的地位更加巩固，它对青年群众的吸引力，也跟着不断地空前地提高和加强了。

不过，这并不如国民党刊物《社会新闻》、《微言》等所说：鲁迅垄断了文坛，或者，左翼作家包办了《自由谈》。这样说没有一点事实的根据。譬如吧，上面提到的章太炎和吴稚晖，本是多年夙敌，“老死不相往来”，他们的终于在同一刊物上出现，试问，难道这是什么“垄断”和“霸占”所能解释得了的吗？《自由谈》改组不久，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刊出启事，声明“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小说《时代与爱的歧路》业已数月，近来时接读者来信，表示倦意。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，自明日起将《时代与爱的歧路》停止刊载”以后，《微言》和《社会新闻》捏造事实，大肆宣传，说黎烈文在鲁迅指使下，排斥异己，“腰斩张资平”，企图为“左联”建立“清一

色”的天下。他们把《自由谈》描绘成“赤色王国”，而鲁迅就是这个王国的“暴君”。“新闻”迅速地在小市民中间传播，互相告语，耸人听闻，说穿了自然是不值一笑的。当然，每个副刊都有自己的倾向，有倾向便有立场；为了团结作家，照顾《申报》的历史渊源，只要不违背这个起码的立场，文章便很容易在《自由谈》刊出。我甚至觉得，《自由谈》其实是五四以来一个最讲究广泛团结，真正做到“兼容并包”的刊物，章太炎与吴稚晖固然是一个例子，为了证明这点，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人不大知道或者不大留意的事情来。

就以鲁迅和《自由谈》的关系为例吧，国民党刊物一直诬蔑他气量狭窄，不能容人，黎烈文言听计从，奉命惟谨。所谓“腰斩张资平”就是按照这个调子宣传开来的。那时还有一种说法，叫做：“挤掉”张资平，“气跑”曾今可，鲁迅率领“喽啰”包办了《自由谈》。事实怎样呢？我想指出的是：自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开始，有一个时期几乎隔天一篇，用笔名为《自由谈》写开篇文章的岂凡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鲁迅说的在《人言》上译载《谈监狱》，“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”，文章“含着甚深的杀机”的“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”^①。其次，被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称为“讨伐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”^②，化名“陈代”，写了《略论告密》、《略论放暗箭》，自说要从反对鲁迅中“得到一个恶意的满足”^③的林徽音，也始终是《自由谈》的写稿人。再其次，那位说杂文“鸡零狗碎”^④，写杂文的人是“以投机取巧的手

① 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。

② 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。

③ 林徽音：《散文七辑·序》，绿社出版部，一九三七年一月。

④ 林希雱：《再多些与再少些》，《文艺画报》第一卷第三期，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。

腕来代替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严肃的工作”^①,而自己却不断地写着杂文的“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”^②,同样在《自由谈》上发表许多短文。这些事实,现在只要翻一翻《自由谈》,便可以一清二楚,用不着饶舌了。那么,又怎么能说垄断了文坛,包办了《自由谈》呢?在当年,作为编辑的黎烈文是明白的,鲁迅呢,他的心里也明白,所以他说:“我知道《自由谈》并非同人杂志,‘自由’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,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。”^③这一段话,和发表在《自由谈》上的一些文章,包括叶圣陶在改版第一天写的《今天天气好呵!》精神完全一致。看来大家都意识到了自己文章的限度。将这些有限度的文章集合在一起,团结了更多的作家,我想,也许这正是《自由谈》的主要的成功吧。

我说限度,并不意味着文章的立场可以模糊,任何事情都有它自己的限度。至于《自由谈》的立场,作为一个副刊,倒是相当鲜明的,这一点表现在大大小小连续不断的论争上。在黎烈文、张梓生编辑的《自由谈》时期,计算起来,这类论争(包括问题讨论)大概不下三十个吧。其中动员人数广泛,文章发表最多的,如大众语论争、儿童教育论争、小品与“方巾气”论争;延续时间久长,先后反复最烈的,如关于翻译论争、旧戏锣鼓讨论、批评与谩骂论争;学术性较强的,如“著教生克”论、“《二十四史》”、“《四库全书》珍本”问题;具有理论深度的,如“艺术论”、“讽刺与幽默”、“写实主义与第一人称”;命题严谨而措词有趣的,如关于“女人与说谎”、“基本英语”、“‘三层楼’与‘骨董’”的讨论;表现轻松而意义重大的,如对“文人

① 林希隽:《杂文和杂文家》,《现代》第五卷第五期,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。

② 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。

③ 《伪自由书·前记》。

相轻”、“京派与海派”、“别字与简字”的驳难；也是文艺界视为平淡无聊，而社会上却到处传播、轰动一时的，如因“腰斩张资平”案、“词的解放”案引起的一系列“启事”对骂，鲁迅说这时候的文坛，好像进“入了‘启事时代’似的”^①。张资平在“启事”中自称“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”，接着笔锋一转：“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……”他故意说自己“又无姊无妹嫁作大商人为妾，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”，问题就转到谁的姊妹嫁给大商人做妾上。放赖撒泼，含血喷人，鲁迅说这是乡村流氓打架时手持“粪帚”的战法，“足令勇士却步”^②。曾今可大吹大擂地刊登“启事”，宣传自己要“悄悄地离开这文坛”，因为文坛过于“污秽”，“如果有人笑我是‘懦夫’，我只当他尊我为‘英雄’”。于是关键又落到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这一点。阿Q精神，跃然纸上，鲁迅说这位“曾大少真太脆弱”，“但恐怕他仍要回来的，中国人健忘，半年六月之后，就依然一个纯正的文学家了”^③。还有胡怀琛考证墨翟为印度人，受到茅盾嘲讽，终于发展为“柳宗元”要求胡怀琛道歉事件；余慕陶抄袭郑振铎《文学大纲》、赵景深《中国文学小史》，结果被封为“余文剪公”的前后经过；加上有人借何家槐、徐转蓬的创作纠纷，挑拨是非，打击“左联”，文坛景象，正反左右，一时都浓缩在《自由谈》上。就报纸副刊而言，《自由谈》确实感应敏锐，包罗万象，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编得相当热闹、相当活泼的一个。

然而《自由谈》的成功又不光因为热闹和活泼。不错，人们第一个印象往往为它的五光十色、绚丽多彩而惊叹。杂感之外，散

① 《伪自由书·后记》。

② 《鲁迅书信集·致黎烈文》，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。

③ 《鲁迅书信集·致黎烈文》，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。

文、随笔、速写、游记、读书记、小考证、文艺评论、科学小品、短篇翻译等等，应有尽有。其中最受欢迎的，是每天一篇属于议论性的杂感文——也即被称为“花边文学”的一种。根据我的记忆，正式采用“花边”将这类短文框了起来，似乎开始于张梓生接编以后。黎烈文担任编辑时期，只框短诗，或在文章斜角加个“花边”而已；不过用两栏地位，排一篇杂感，形同方块，每天见报，却早成为惯例，实际上已经等于没有“花边”的“花边文学”。这种做法，并且为《时事新报》、《中华日报》、《晨报》等同一时期的报纸副刊所袭用，群起仿效，蔚然成风。有的作者甚至说“没有‘花边文学’就不热闹，就不会……抓得住人”，因此自己宁愿为《自由谈》而不愿为其他副刊写稿^①。议论性短文所以受作者读者欢迎，深入人心，原因之一是由于它反应迅速，提出问题及时。《自由谈》上“花边文学”执笔人多，论述既广，剖析更深。我以为是后一点，又和编者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启事所说“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，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”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。

在这之前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，编辑室已曾登出启事，声明《自由谈》除特约稿件外，广收外稿，“凡是合用的稿件，不问作者为谁，决定刊载；凡不合用的稿件，就是最好的朋友的作品，也断然割爱”，以示编者不问亲疏，不论新老，一律从文章出发，公平对待。副刊总的说来做到了这一点。但是，我们现在试着翻阅一下《自由谈》上的文章，尤其是所谓“花边文学”，就会觉得，如果没有那些老作家的引导，不是他们从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提出问题，揭示规律，做到条分缕析，一针见血，文章就不可能达到那么熟练的程

^① 林徽音：《散文七辑·序》，绿社出版部，一九三七年一月。

度，具有那么深刻的水平，副刊的吸引力也会随着减低，这样说，又不得不归功于上述几位已有成就的作家，特别是写得最多的鲁迅了。这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；但在这里，我觉得也应当提到瞿秋白，因为鲁迅的有些文章，也是秋白的文章。正是在《自由谈》这个小小阵地上，鲁迅和瞿秋白，出色地表现了他们俩人之间不分你我、一体战斗的千古不灭的友谊——这是革命的战斗的友谊。

根据许广平《鲁迅回忆录》记载，瞿秋白用鲁迅笔名发表的文章十篇，全部写于一九三三年，连同写作的日期分别为：《伸冤》（三月七日）、《曲的解放》（三月九日）、《迎头经》（三月十四日）、《出卖灵魂的秘诀》（三月二十二日）、《最艺术的国家》（三月三十日）、《关于女人》（四月十一日）、《真假堂·吉诃德》（四月十一日）、《内外》（四月十一日）、《透底》（四月十一日）、《大观园的人才》（四月二十四日）。其中《关于女人》、《真假堂·吉诃德》发表于六月十五日出版的《申报月刊》，署名“洛文”，其他全部刊登于《自由谈》。除第一篇和最后一篇署名“干”外，别的都署“何家干”，发表日期一般比写作日期迟两天，相差最多的为八天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大家都因袭许广平的说法，以为瞿秋白用鲁迅笔名发表的文章共计十篇，如果仔细统计一下，实际上应为十四篇。一九五七年版《鲁迅全集》注释中另有两篇，即《王道诗话》（三月五日）、《中国文与中国人》（十月二十五日）。后一篇较晚，收入《准风月谈》。还有其他两篇是：一、《〈子夜〉和国货年》，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及三日，署名“乐雯”，“乐雯”是鲁迅的笔名；二、《儿时》，发表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，署名“子明”，“子明”也是鲁迅的笔名。我曾根据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夜鲁迅致黎烈文所说：“无聊文又成两篇，今呈上。《儿时》一类之文，因近来心粗气浮，颇不易为；一涉笔，总不免含有芒刺，

真是如何是好。”^① 将《儿时》当做鲁迅的文章收入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。以后在瞿秋白遗稿里,发现这篇短文的剪报,证明它和《伸冤》等一样,也是用鲁迅笔名发表的瞿秋白的杂感,所不同者,《儿时》、《〈子夜〉和国货年》两篇,没有收入过鲁迅杂文集,仅仅是借用鲁迅的笔名,在《自由谈》上公开发表而已。

许广平还追述了瞿秋白和鲁迅商讨这些短文的经过,着重地谈到瞿秋白,文章说:“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,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,经过两人交换意见,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,然后由他执笔写出。他下笔很迅速,住在我们家里时,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、三时为休息时间,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,都不去打扰他。到时候了,他自己开门出来,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,给鲁迅来看。”^② 这一情景写得很是精彩,看似平凡,不事雕饰,然而却亲切、动人,像一幅图画,内涵的精神十分丰富,美,让人似乎看到了一个活着的瞿秋白,一个手拿诗卷笑吟吟的潇洒不凡的瞿秋白。这是我们研究瞿秋白发表在《自由谈》上那些杂感时需要珍重参考的材料。

也许有人会说将瞿秋白的杂文比作诗卷不大恰当,应该说成匕首才是,我以为即使有匕首的作用,也仍然是诗——一束诗。《自由谈》常登漫画,兼刊民歌,新诗以短小的居多。虽然不像别的副刊那样经常登诗,但说它不重视是不对的,类如《周作人诗读法》(林语堂)、《从孔融到陶潜的路》(曹聚仁)、《“请教先生‘两’首诗”》(痰迷)等固然是杂感文的变相,但它毕竟连续发表了陈子展的《诗

① 《鲁迅书信集·致黎烈文》,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夜。

② 许广平:《鲁迅回忆录·瞿秋白与鲁迅》。

经试译》，刊登了许多研究和讨论新诗与旧诗的文章，同时，它还要求每一篇短文都是诗，都有诗意，因此《自由谈》又发表了许多美丽的诗一样的散文。

我以为这方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艾芜，他以“岳萌”、“刘明”、“斐儿”等笔名，先后为《自由谈》写了为数不少漂亮的散文，形式有游记也有速写，边陲风光，异国景色，一一映入笔底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。此外如叶紫、何谷天、草明、彭家煌、黑婴等，也在速写、小小说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，各个表现了他们熟悉的富于乡土色彩的生活图景，连诗人臧克家、蒲风也写了寄意深远的短文。至于有关考证和掌故文字，阿英写得最多，子展的《蓬庐絮语》很受欢迎。他和黄芝岗两人对旧戏锣鼓的讨论，本来是属于戏曲和音乐范围的问题，与时事无关，由于化名讨论，历时较久，居然引起种种猜测，豺狼当道，人命危浅，在谣诼纷纭中，不得不偃旗息鼓，足见当时政治空气之低沉与凛冽了。

黎烈文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编《自由谈》，至一九三四年五月九日刊登启事，宣布辞职，他借口现因事忙，无暇兼顾，“自即日起，关于本刊一切事项，由张梓生先生主持”，前后编了一年六个月零九天。这个“即日”我记得比较清楚。那时何家槐、徐转蓬的创作纠纷已近尾声，从四月十四日廖沫沙发表《人间何世？》开始，关于《人间世》也即小品问题的论争正在展开，先后发表的有《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》（林语堂）、《过去的幽灵》（胡风）、《谈“小品文”和“幽默”》（由）、《论文坛上的摩登之风》（古董）、《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》（曹聚仁）、《周作人诗读法》（林语堂）、《关于小孩》（大野）、《方巾气研究》（林语堂）、《论“天真”》（吴容）、《小品文的生机》（崇巽）等文章。林语堂在《周作人诗读法》一文中，怀疑有些文章

为“登龙未就”的章克标所写，因此中间还夹着郭明、谢云翼、林语堂、章克标的来往函件，互相驳难，战火正烈。到五月九日黎烈文声明辞职那天，又登出痰迷的《“请教先生‘两’首诗”并序》。两首诗写得很好。序文说：“知堂老人，五十自寿有诗。海内名流，纷纷奉和。独在某公‘拂地裤缘疑病马’一联，可谓奇绝。此外，‘茶苦由来即苦茶’，亦可算见道之言。迷亦好诗，藉韵奉林先生两首，以博一粲。”第二天，也就是五月十日晚上，林语堂为《人间世》创刊在忆定盘路（今江苏路）寓所请客，谈到黎烈文辞职的事，林语堂说这诗是临去的“马后炮”。又对执笔者作种种推测。筵散回寓，鲁迅雇车将徐訏（《人间世》两编辑之一）和我顺道带至北四川路，他在车中问我批评林语堂的究竟是哪些人，我说我不清楚，但发表在《自由谈》上的不像是章克标的手笔，理由之一是立论公允，没有一点挟嫌报复的痕迹。我还觉得《人间何世？》这个题目很好，虽然作者说创刊号登着周作人十六吋放大照片，又是旧诗，又是黑边框起来的手迹，一时还以为“错买了一本摩登讹文”，这话不免刻薄，但看上去可又实在相像哩。

张梓生接编以后停止了这个论争。但《自由谈》内容基本上和先前相同，说得上一句“萧规曹随”。到得这年九十月间，形势又紧张起来，十一月十三日，《申报》总经理史量才被南京政府派特务暗杀，副刊编者受到内外压力，不得不涂上一层保护色，逐渐用文艺短论代替了社会批评，使冲突不那么直接。如果我的记忆不错，那时张梓生已经不大露脸，而由吴景崧出面代行一切。景崧自己以“向隅”笔名，写了一些评论，至于将文艺问题用短论形式作较多发挥的，是辛人、任白戈、张香山、屈轶（王任叔）、梅雨、林林、立波诸人。至于当时受大家注意的文艺理论家，其中胡风一改过去用“古

飞”笔名写《西崽哲学》、《辩证法与江湖诀》的兴头，似乎不大为《自由谈》执笔，周扬继续以“企”、“企影”、“左企”等笔名，介绍外国文学，诸如《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》、《现实的与浪漫的》、《忧郁的文学》等篇。《自由谈》上的那些文艺短论，虽然篇幅太短，言不尽意，但因刊登及时，仍然受到了作者、读者普遍的欢迎和关心。

诚如子展所说，《自由谈》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写到的副刊，应当归功于以鲁迅为首的一批老作家的倡导和前引，这一点是不能抹煞的。但我还想补充几句。有一次，我曾亲自听鲁迅对编者黎烈文说：办刊物，开始时拉老作家帮忙，但出了几期，总是这几个老人却不行。刊物办得是否出色，不仅在于有没有好文章，还要看它是否培养了新人。我不知道编者对这段话作何感想。但从黎烈文到张梓生，在大约两年十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无论是杂感，是散文，是探讨文艺原理的短论，都像野草一样在磐石底下曲折地生长，出现了一批新人。即以创作家为例，已经成名的靳以、芦焚、欧阳山、白尘、徐盈暂且不说，新起的如姚雪垠、刘白羽、周而复、林娜（司马文森）、柯灵、黑丁、荒煤、罗洪等，也大都发矬于此，在这里试练他们的笔墨。真的，作杂感的人多起来了，写散文、小说的人多起来了，攻文艺理论的人多起来了，历尽艰险，经过磨砺，曾是三十年代文艺大军的一个小小支队，终于脱胎蜕壳，逐渐地走向了壮大，走向了坚实。

现在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。我们的生活起了空前的变化，我们的队伍有了惊人的发展，时移世易，追思畴昔，恰如登山的人中途回顾，虽然眼底历历，想起来却又似真似假，将信将疑，不管人们感觉的是赞叹，是惋惜，是颂扬，是鄙夷，总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我们

的来处,我们的起步点,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吧。仅仅这点,我以为也是一件大有意义的事情。

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

(选自《唐弢文集》第九卷)